

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

中国与基督教

——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

〔法〕谢和耐 著

Jacques Gernet



CHINE ET CHRISTIANISME

première confrontation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013029425

B979.2

27

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

中国与基督教

——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

[法]谢和耐 著

耿昇 译



2013年·北京



北航

C1638317

B979.2

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法)谢和耐著;耿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
ISBN 978-7-100-09008-7

I. ①中… II. ①谢…②耿… III. ①基督教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0048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与基督教

——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

[法] 谢和耐 著

耿 昇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008-7

2013年2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定价: 45.00 元

法国汉学界对于中西文化 首次撞击的研究

(代重版序)

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领域,始终是法国汉学界的重镇之一,专家辈出,成果丰硕,在欧美国家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拟就法国在该领域中的研究成果略作介绍,仅限于16—18世纪的入华耶稣会士,对于清代中后期以及其他修会的传教士,尤其是新教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已不属于“首次撞击”范畴,本文概不涉及;对于中西文化首次撞击之外的活动,亦暂不论及。

笔者始终认为,在该领域的研究态度上,必须做出几种区别。首先要把鸦片战争之前的入华耶稣会士与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在中外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的新教传教士区别开来。前者完全受中国政府控制,他们于在华传教方面是失败的,于文化传播方面却成绩斐然;即使在文化传播中,他们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方面,也远不及他们在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方面的成绩显赫。后者却依赖不平等条约和西方的坚船利炮,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中国为所欲为,不少人成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军事、经济与文化侵略的工具或马前卒。其次,动机和效果并非始终都是统一的。教廷和西方列强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其目的,就是要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希望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但早期传教士们入华后的

所作所为,却与此宗旨不大相符,这也正是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和耶稣会被强行解散的主要原因。再次,要对具体人员作出区别。后期有些传教士确实作恶多端,干涉中国内政,鱼肉乡民,从而激起民愤,甚至被情绪激昂的民众打伤或打死,由此爆发了一系列“教案”。但也有一些传教士,甚至还可能是其中的多数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曾做过一些好事和善事,在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中做出过贡献,甚至是很大的和他人无法取代的贡献。

法国学者们在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中,基本上还算是客观公正,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甚为熟悉并充满友好感情,能够直面这股中西文化首次撞击与交流的浪潮。

法国学术界在本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正是本书的作者,原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和现任名誉教授、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先生,他也是国际汉学界从事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比较研究的一大权威。1982年,恰逢利玛窦入华400周年(1582—1982)之际,谢和耐教授推出了享誉海内外的著作《中国与基督教》,此书先后被译成十余种文字(英、德、意、西、葡、荷、瑞典、波兰、日、韩等),也有笔者本人的中译本。谢和耐教授详尽地分析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文化、社会、思想意识、世界观和伦理诸方面的殊同,进而得出结论:中国可以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交流与接触;某些中国人,甚至是某些中国文人士大夫和精英分子,也可以受归化成为基督徒;基督—天主教可以作为中西文化撞击交流的一条主要渠道,中西双方可以在真正了解或误解的基础上,达成某种程度的表面共识。但是,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

化”，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绝对不可能像西方或其他某些国家一样，成为一个基督—天主教国家。中国始终在强烈地坚持自己那悠久的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儒家文化虽有开放性和兼容性，但其“同化性”却表现得更为强烈。先后传入中国的各种文化（佛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最终都被严重同化、“本土化”或“儒教化”了。耶稣会士们采纳了利玛窦等首倡并亲自试验实施的那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适应政策”。因此，基督教文化在中国不可避免地会“本土化”。于明清之际的中西首次文化撞击中，西方所关心的是向中国传播基督宗教及其文化，而中国最感兴趣的却是西方相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种文化交流实为一种“直面撞击”，双方各怀心计，各有打算。由于谢和耐先生此书出版之时，正值西方学术界纪念利玛窦入华 400 周年的高潮中，所以震动格外强烈。从总体上来讲，它在西方学术界的汉学家中赢得了很高的支持率、很大的荣誉和普遍的好评，特别是荷兰的许理和(Erik Zürcher)、丹麦的伦伯格(K. Lundbaek)、德国的柯兰妮(Glaudia von Collani)、澳大利亚的保尔·鲁尔(Paul Rule)和法国的鄂法兰(François Aubin)等，他们基本上都倾向于赞成和肯定谢和耐先生的观点。但在西方神学界的汉学家中，却也招致了不少激烈批评。由神学界汉学家们主办的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最初两届曾邀请谢和耐教授去主持大会。自此书出版后，甚至不肯邀请他与会了。反对最激烈者有美国旧金山大学的马爱德(Edward L. Malatesta)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魏若望(John W. Witek)、法国利氏学社的甘易逢(Yves Raquin)和顾从义(Claude Larre)等人。这些神父们出于其“天下归主”的坚定信念，当然会对谢和耐教授的观点提出异议和非难。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谢和耐教授分别于 1988 年

在《天主教与亚洲社会》的文集中发表了《17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于1993年在《欧洲在中国》的文集中发表了《中欧交流中的时空、科学和宗教》，于1998年在《中国研究》中发表了《再论中欧早期的文化交流》等雄辩的论文。他于这些力作中有力地捍卫并发挥了自己在《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提出的许多论点。他再次强调，中国爱国的官吏和士大夫们都注意严肃伦理和正统精神，关心为国效力和为民造福。入华耶稣会士们从事对行政管理、韬略、兵器、治水、农业或手工业生产的机器之研究和介绍，同时也主张严肃的伦理、注重实用科学技术、主张恢复正统。因此，在中国文化精英与传教士之间，便于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误解的基础上，达成了表面的共识。基督教也通过“适应政策”而在中国找到了立足点和支撑点。但中西世界观或时空观相差甚殊：西方继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传统结合起来之后，使感性与理性之间出现了原则性差异；对于创世和支配世界的上帝之信仰，是无上而不变的原則。基督教西方利用了斯多噶学说和新柏拉图主义所提供的內容，在有关父子圣体共存论、基督的人性和神性、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烦琐哲学的讨论中，在由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于天主教徒中引起的反响中，痛苦而缓慢地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而进入近代。而中国的时空观是自《易经》和印度佛教继承而来的，它在中国产生了一种不稳定性，即无限宇宙的永久变化之思想。中国对于只有感性知识的一切都明显地不信任，不了解宗教权与世俗权之间的基本区别。所以，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时的混乱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从文化角度来讲，西方列强企图让中国放弃和毁灭其遗产而全盘西化，这是完全行不通的。

谢和耐教授在1972年初版并分别于1988年和1990年再版

的《中国社会史》(有笔者中译本)一书中,也设立专门章节论述了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问题。他指出,耶稣会士们在天文学、算学和地图学等领域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耶稣会士们是中国算学于17—18世纪复兴的主要促进人,他们在诸如农业和手工业等实学领域中也产生过影响。但西方在17世纪时,各方面并不比中国占据优势,中西在这个时代有许多相互学习的机遇和内容。例如,当时中国的传统天文学要比利玛窦传入的天文学更为“近代”一些,利氏不了解欧洲天文学的最新成果,依然忠于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而托氏理论又与中国人的思想和习惯互相矛盾。

谢和耐教授于1979年在《第欧根尼》(*Diogène*)杂志第105期中,发表了《17世纪基督徒与中国人世界观之比较》一文。文中指出,在入华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科学问题上,要避免两种错误倾向:第一种错误倾向是把入华耶稣会士们传入中国的科学,看得比它的实际情况要先进得多。第二种错误倾向是认为中国一切都要向西方学习,把传教士们的布教活动在中国所引起的批评与沉默,都归咎于中国人的愚昧、仇外和狭隘地坚持民族传统等因素。欧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认为起源于西方的定律和原理都是最高明的。欧洲科学从16世纪末起传入中国,这主要不应归功于传教士们的积极性,而主要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需要,中国人主动地对西学表现出了好奇与兴趣。因为传教士们并不是为了讲授欧洲数学和天文学,而是为了传播其宗教才远涉重洋到达中国的。谢教授于1973年在《宗教社会学》杂志中发表的《中西文化首次撞击中的政治与宗教》一文中指出,中国人越来越熟悉基督教教理,最终不再受利玛窦所采取策略的欺骗了。他们认为传教士们的宗

教与佛教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后来又成了辟基督教大论战的基础,即认为基督教仅仅是对佛教的粗暴歪曲和变种。利玛窦正是通过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性,才在开始阶段于中国获得了成功。他后来被迫通过自己的“西儒”身份,才插足于中国文化潮流的总趋势之中。谢和耐教授于1976年在《第一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中发表的《16世纪末—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中指出,明末清初的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对话很困难,他们出于各自文化传统的原因,没有也不准备互相理解。当时,中国人不理解纯属西方思想的抽象逻辑,欧洲对于中国思想也只具有一种肤浅的理解,而且是那些有碍于基督教传播的思想。所以,从哲学角度讲,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尚有许多障碍有待于克服。

谢和耐教授在他50多年的汉学生涯中,基本上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学科为中心而展开的。他当然会关注明清之际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大变迁的同步化,入华耶稣会士正好适得其时地充当了中西交流与撞击的媒介。他始终不间断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屡有新作发表。1994年,他的汉学论文集《中国的智慧》出版。在书中收入的25篇论文中,有关明末清初耶稣会士问题的专题论文共有6篇,分别从哲学、宗教、政治和观念诸方面,论述了16—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贡献、遇到的困难和阻力、造成的撞击、负面和正面影响等问题。

谢和耐教授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界,对16—18世纪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一派学术观点的代表人物,值得向中国学术界全面介绍。

法国学术界在本领域中的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汉学家,是原

任教于设在敦刻尔克的海滨大学和现就职于巴黎第 8 大学的迪代伊(Jean-Pierre Duteil)教授,法国的文学博士。他于 1994 年出版了其博士论文《上天的使命——入华耶稣会士的作用》之巨著。全书充分地利用了拉丁、葡、法、意、德、英和荷兰等文字的文献,深入论述了从方济各·沙勿略(François Xavier, 1506—1552)1552 年客死于中国广东上川岛,到耶稣会于 1774 年被解散之间的 220 多年间,入华耶稣会士们在传播宗教和中西文化交流中,曾起过的作用、扮演过的角色。全书共分 5 篇 14 章,全面、深入、客观地论述了耶稣会士们入华的历史及其在华活动的梗概,并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本书具有三大突出特点,其一是书中对于中国礼仪之争所经历的过程,做了详细阐述。当时基督教中国传教区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应该如同西方殖民列强于其殖民地中所实施的那样,采取“彻底摧毁”的政策,还是要运用由教祖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Royola)于其教谕中提倡,并于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由利玛窦和范礼安等亲自实施的“适应”政策。后一种政策获得了某种成功,但却受到了其他修会和教廷的抨击,甚至在耶稣会内部也有异议。该书的第二大特点,是突出了葡萄牙人入华耶稣会士所起的重要作用。迪代伊经过认真而仔细的研究,统计出葡萄牙籍入华耶稣会士于 16 世纪末是 113 人,1600—1650 年是 94 人,1650—1700 年是 81 人,18 世纪为 108 人。除了在 17 世纪,法国以 159 人而超过葡萄牙的 94 人之外,在其余时段,葡萄牙在人数上始终占据优势,而且他们在文化、贸易和政治方面,也都做出过不平凡的业绩。该书的第三大特点是资料极其丰富。作者共参阅了近 800 名人华耶稣会士的档案、书简、年度报告,特别是他们有关中国和远东的著作。但令人遗憾的是,作者

不如谢和耐先生那样精通中文、熟悉中文史料和了解中国的国情。故当他从中国一方着眼论述时，明显有些难以驾驭。作者于第4和第5编中，分别从军事、外交、官制、科举、司法、婚姻、科学史、天文学、纪年学、语言语音学、舆地地图学、度量衡、医学、动植物学诸领域着眼，分门别类地论述了耶稣会士们在中西双向交流中所起的桥梁和媒介作用。作者在结论中指出，在18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在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哲学体系形成中，曾起过重要作用。自1750年之后，无论是卢梭、狄德罗还是布丰，他们受中国的影响远不如先前那样明显了。欧洲根据耶稣会士们的书简和著述，“重塑”了一种中国形象。在旧制度时期（法国1789年之前的王朝）的最后几年间，人们理解了中欧之间的差异性超过其相似性，西人更多地不再是关注归化中国人的事业了。在18—19世纪的世纪之交，中欧之间的互不理解占据了突出地位。无论如何，欧洲的宗教信息是与科学同时传播的，传教士们只提供了一个有限时代的中国形象。

迪代伊教授对于葡萄牙入华耶稣会士格外偏爱。1996年，他又推出了葡萄牙入华耶稣会士曾德昭（Avarez Semedo, 1585—1658）于1642年初版的《中华大帝国通史》的最新译注本。曾德昭在1620年之前的汉名叫做谢务禄。他于1613年入华，后与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南京教案之前的汉名是王丰肃）一起，于1616年受沈淮策动的南京教案牵连，被放逐于澳门。1621年，他又以曾德昭的名字潜回江西，并出任传教区的中国副省长。曾氏在华共生活22年，是利玛窦“适应”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和忠诚实施者。他坚信要想归化全中国，必须首先归化中国皇帝及其有权势的亲信和心腹，然后才能造成“望风而归”的局面，以图在中国制

造一个新的“君士坦丁大帝”。因为“君士坦丁大帝”(280—337)是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奠基人。所以,曾德昭于1642年出版了其《中华大帝国通史》一书。此书虽美其名地冠以“通史”的书名,其实却是一部晚明史。该书原文用葡文所撰,最早却是以卡斯蒂利亚文(中部西班牙文)出版,后来被译成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本,但其原著始终未以葡文发表。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本,仍是从其他语言翻译而来的。该书基本上是以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为模式而写成的。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中国社会的概览,描述了中国的制度、风俗与日常生活,它证明了17世纪的西洋人已对中国有了一种明确的概念,它们形成了西方对中华世界的最早总结。第二部分论述了中国的宗教状态,重点是自利玛窦入华后的中国传教史。书中对于明朝皇帝、皇宫及各级官府的记载,尤为详尽和珍贵。

迪代伊于1999年又推出了法国赴华和越南北部的耶稣会士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 1593—1660)的《交州王国史》一书的最新注释本。罗历山于1624—1645年间先后于广东、澳门和北部湾(交州)传教,但主要是活动于越南北部,是越南文字拉丁化的设计人。《交州王国史》一书是在他返回欧洲后于1650年用意大利文发表的,于1651年被译成法文,1652年又被译成拉丁文。他的其余7部有关中国、越南和远东的著作,也先后于1650—1653年间刊行。《交州王国史》一书共分两卷82章,对于缺乏详细文字记载历史的交州(东京湾或北部湾),则显得格外珍稀。它是西方研究17世纪中国南部、北部湾和越南的少有专门著作之一。

原为巴黎大学比较文学讲座的主持人、学贯西中的法国著名作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学教授安田朴(René Etiemble, 1909—

2001)先生,也是法国从事中西文化交流与比较的一代宗师。他于1965年就推出了一本《入华耶稣会士与礼仪之争》,成为法国60年代研究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重要历史性和理论性著作。该书以原始历史文献为基础,对于萦绕中西关系两个多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缘起、发展过程、后果及其影响,均做了颇有见地的探索。作者从这场在中国人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于欧洲爆发的以中国为对象的大争论中,得出了一种基本结论,即“宽容的哲学中国”和“不宽容的基督教西方”。由于控辩双方的激烈争论,一方面使中西文化交流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极大的撞击,使之受到很大的阻力和诸多的障碍;另一方面又在西方促产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论著,激起了西方17—18世纪的一场“中国热”风潮,使西方哲学家们得以利用中国形象而向欧洲守旧派、“无耻行为”和教权挑战。

安田朴先生多年在巴黎大学主持中西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讲座,其讲义被编成了一部《哲学的东方》(与“基督教的西方”相对应),最终于1988年和1989年分上下卷,出版了《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此书有笔者中译本)。在这部两卷54章洋洋大观的论著中,从第13章开始便完全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线而论述。作者主要追述了欧洲从16—18世纪的“中国热”风潮起,到鸦片战争之前的“仇华”过程。作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热”风潮完全是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误解和本国需要为基础的,与西方殖民列强日益强盛和中国国势日渐衰落有关。书中特别指出,欧洲大思想家们更多的关心之处,是利用中国为他们的政治哲学增光或作为陪衬,完全不在于纯学术方面。他们对中国所作的评价,同样也取决于他们捍卫的论点和立场之需要,而并不是入华耶稣会士们

勾勒出的中国的真实形象。入华耶稣会士们自己的言论也受到了约束,他们一方面要维护其身负的使中国福音化的职责,另一方面又致力于研究由发现中国而在欧洲激起的冲击波。拉摩特·勒瓦耶、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伏尔泰、达尔让斯、孟德斯鸠、魁奈和重农派(以杜果为代表),都深受中国的影响,他们对于西方接受中国文化起过重要的作用。

入华耶稣会士中有一批宫廷画家,有的成为中国皇帝的御用洋画师。他们将西洋画传入中国并向欧洲介绍中国画,在中西绘画和艺术交流中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法国学者中,研究入华耶稣会士画师的专家,主要是巴黎艺术博物馆的伯德莱(Michel Beurdeley)教授,他于1971年出版了《中国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画家郎世宁》一书。书中首先介绍了意大利人华耶稣会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的生平及其在华活动的历史,接着又分门别类地介绍了郎世宁作为建筑艺术家而在建筑圆明园中作出贡献、他奉敕命制作的16幅铜版画《乾隆得胜图》(表现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盆地及附近回疆的武功图)、作为宗教画家的郎世宁(南堂的宗教透视画)、作为人物肖像画家的郎世宁(乾隆皇帝及其嫔妃们的画像)和作为山水动物画家的郎世宁(百骏图、飞禽和山水花卉画)。该书接着便论述郎世宁与其时代的中国画家(年希尧、张照、于敏中、钱陈群、钱载、沈德潜、唐岱、邹一桂、吴历等)的交往关系与学术切磋。全书最后介绍中国历代画家、文人、辞书、书籍和报纸杂志对郎世宁的评价。书中发表了郎世宁的书简及其主要绘画,它们现在分藏于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北京、热河与台北等地的美术馆、博物馆和图书馆。作者认为,入华耶稣会士画家们所追求的是传播其宗教信仰,而不是将其文化

强加于人。入华传教士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将被视为中国皇帝的臣民并且很难再返回欧洲故里,很可能客死于异国他乡,所以他们极力学习并适应中国文化。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入华耶稣会士画家们才在保持其宗教信仰的同时,又采纳了中国的绘画技术;而吴历那样的中国传统文人和画家,在保持其中国绘画传统艺术的同时,却变成了一位天主教司铎。但传教士们对于中国画的论著,也有误解和偏见。他们从未将任何中国绘画的中文论著译成西方或寄往欧洲,而只是热衷于撰写有关历史、文学、音乐、瓷器等方面的论著。

伯德莱于1997年又出版了一部《18世纪的入华耶稣会士画家》。全书图文并茂,共分12章记述,发表了入华耶稣会士郎世宁、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 1702—1768)、艾启蒙(Ignace Sichelbarth, 1708—1780)、蒋友仁(Michel Benoît, 1715—1774)以及遣使会士德理格(Téodorico Pedrini)、奥古斯定会士安泰(安若望, Jean Damascene)等画家,特别是在康乾皇帝宫中充任御用画师者的130多幅作品。重点论述了郎世宁与王致诚在宫中作画、耶稣会士们与乾隆合作、热河木兰围场秋猕图、版画《乾隆皇帝得胜图》的制作、建筑圆明园的艺术喷泉(大水法)与西洋楼、耶稣会士们的山水花鸟画与人物画。作者最后讲到耶稣会被解散之后,仍有几位原耶稣会士留在乾隆末年的宫中,他们大都是对皇宫有用的人,包括绘画在内。这其中包括意大利籍入华耶稣会士潘廷璋(Giuseppe Panzani, 1734—1812),他以乾隆皇帝的画像作为《中国杂纂》的卷首插图而名震法国。当时留在清宫中的洋画家还有贺清泰(Louis-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和钱德明(J. J. M. Amiot, 1718—1793)等。作者特别研究了在雍乾时代(1723—1795),

耶稣会士们为瓷器装饰而绘制的浅灰单色画,尤其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殷弘绪(François-Xavier d' Entrecolles, 1664—1714)在瓷都江西景德镇的作品。这批绘画证明,18世纪的中国绝不是西方所流传的那种负面形象:僵化、鄙视经商和利润或国际贸易、拒绝外国最新创造发明等。总而言之,由于这批入华耶稣会士画家主要是生活在康雍乾盛世时代,所以他们的绘画活动形成了中西艺术交流史上的一次高潮,也就是中西艺术文化首次撞击的明证。

中国艺术图案是由入华耶稣会士们传向欧洲的。法国17—18世纪的博韦壁毯中就出现了以中国图案作为背景装饰的技艺。欧洲瓷器中也出现了中国式的装饰图案,欧洲经销商也向中国瓷窑提供图案以生产定向销售的“订货瓷器”。法国圣迪埃(Saint-Dié)博物馆于1981—1982年间举办了一次,“1765—1830年法国东部瓷器制造中的中国式装饰图案”的展览,并为这次展览出版了一本精美的图文并茂的书。书中特别论述了中国装饰图案风靡欧洲的全过程:法国17世纪的异国情调风格绘画、1650—1800年欧洲的“中国式”装饰图案、1650—1830年欧洲采用中国装饰图案的实例统计表、中国装饰图案的断代等,特别是斯特拉斯堡、尼德维耶、阿佩里等地区的中国式图案,最后是有关法国东部瓷器制造作坊中的“中国式”图案等问题。

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hieu Ripa, 1682—1745)不属于耶稣会,但他在华期间与耶稣会士的交往甚密,所以在此略作介绍。马国贤于1710年1月2日到澳门,于1710—1723年在清宫为康熙帝做御画师、版画家和地图家,曾著有《清宫十三年》的回忆录。法国学者柯孟德(Christophe Commentale)于1983年在台湾欧语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法文译注本《马国贤——中国宫廷中的绘画

家、版画家和传教士》。柯孟德还在法国和日本发表过多篇有关马国贤的论文。作者认为马国贤实际上是继承了利玛窦、艾儒略及利氏弟子倪一诚(Jacques Niva)和游文辉(Emmanuel Pereira)等传教士画家,特别是宫廷洋画家的世系。马国贤之前的耶稣会士画家形成了传教士艺术家入华的“第一次浪潮”,以纯传教为目的而关注绘画。“第二次浪潮”则以耶稣会士王致诚和郎世宁为代表,在宫中绘画,同时也注重版画。马国贤正处于这两次浪潮的转折点上。在第二次浪潮中,他们的代表作是1769—1775年的一组版画《中国皇帝得胜图》(《乾隆皇帝得胜图》),本是庆祝清朝皇帝平定厄鲁特人之武功的。在此期间,传教士们既必须服从皇帝的要求,又要从事归化中国人的事业。马国贤用绘画来表现一切内容,但他更喜欢的是人物画而不是风景画。马氏培养了许多中国弟子,如河北的殷若望、谷文耀、黄巴桐和江苏的吴露爵等,而表现承德避暑山庄三十六景的铜版画则为其版画代表作。马国贤的《清宫十三年》一书,记述了他在华的全部活动。

在中西艺术交流与撞击的问题上,法国学者对于在入华耶稣会士们协助下,于1747—1768年间在乾隆皇帝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中建造的西洋楼和长春园,做了大量研究,其成绩引起了世人的惊奇。法国汉学家毕梅雪(Michel-Pirazzoli-tS'erstevens)主持了一个专门研究组,其重点是研究西洋楼和御花园的建筑年代、建筑技术及其用途,考证1783年的西洋楼版画和其他“老照片”,建筑复原、植物鉴定与西洋建筑模式的应用。他们近年来已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杜兰和若纳塘的《乾隆皇帝的京西休闲地》(1987年)、毕梅雪的《西洋楼的历史和传说》(1987年)、《郎世宁与乾隆皇帝的西洋楼》(1989年)、杜兰和萨里耶的《中国皇帝西洋楼版